



白求恩大夫

周而复

人民文学出版社



白求恩大夫

胡 西 复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 九 九 七 年 · 北 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求恩大夫/周而复著. - 2 版.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6 重印

ISBN 7-02-002186-7

I. 白… II. 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7354 号

封面设计: 秦 龙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34 千字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6.625 插页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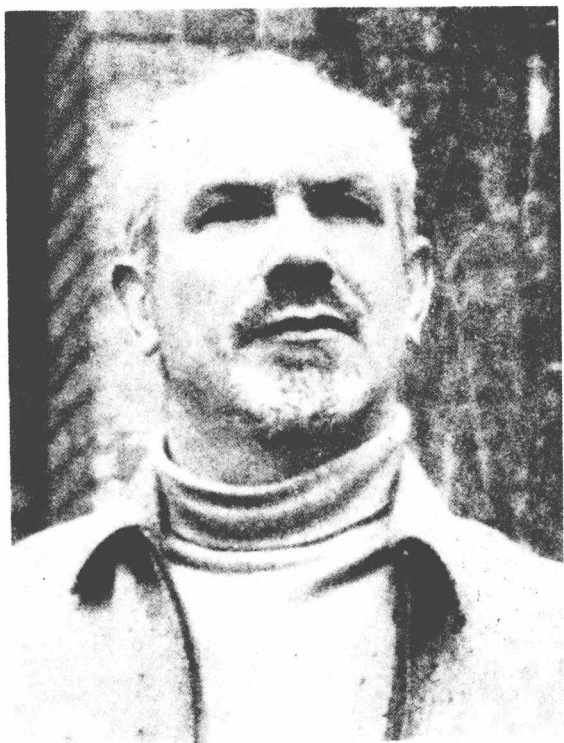
195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80 年 1 月北京第 2 版

1997 年 6 月北京第 7 次印刷

印数 157501-162500

定价 8.50 元



白求恩大夫



周而复 一九四九年春在香港

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毛泽东：《纪念白求恩》

谈《白求恩大夫》(代序)

宁婴同志：《白求恩大夫》是篇文，讲小白的恩来白士热义主洞，人……你希望我谈谈《白求恩大夫》这部小说创作有关的问题，因为有事在宁夏待了一段时间，未能及时动笔，迟迟应命，十分抱歉。

最近又有一些同志和读者问到有关《白求恩大夫》的问题，促使我早日答复。

我在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前后待了四个年头，我回到延安以后，抗日民主根据地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和事迹日夜萦绕在我的脑际，迫切地感到有责任及早用文艺形式写出来，报告给前方（包括敌后广大地区）和后方人民；特别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同志的英雄事迹，更需要早日写出，不尽早写出，心里感到不安。

当时我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组织上也给我创作任务，除了写秧歌剧和报告文学外，就写了《诺尔曼·白求恩断片》，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日写完，纪念白求恩逝世五周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这是用报告文学形式写的。

文章发表以后，觉得过于简略，因为在报上发表，写作时间又比较仓促，不能写得太长，全文两万多字，在当时《解放日报》发表这样的文章，可说是够长的了。虽然写了这篇报告文

学,但并没有完全尽了我的责任。白求恩的光辉形象,和白求恩一道工作的中国同志的英雄形象,以及晋察冀英雄军队和英雄人民的形象时常在我脑海里出现,希望有较充裕的时间能够写出来。

不久,党组织分配我到重庆担任其他工作,这个愿望暂时不能实现了。直到一九四六年,才有时间考虑写部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的小说,这就是《白求恩大夫》。

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光辉名篇里指出:“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根据毛主席对白求恩的崇高评价和指示,我构思怎样写《白求恩大夫》这部小说:既要歌颂白求恩,也要歌颂党中央、毛主席所领导的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八路军和群众;小说中所要反映的矛盾是什么?是在工业落后地区物质条件极端困难象晋察冀根据地这样地方如何正确进行抗日卫生医疗工作。在敌后进行医疗救护工作,白求恩和中国军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但白求恩是加拿大战友,不了解中国,更不了解处在敌后的晋察冀根据地,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提出这样意见或那样意见,甚至批评,因而产生矛盾,但最后白求恩了解到实际情况,矛盾便解决了。他有时进行自我批评,甚至检讨,如他为方主任学习事,就向当时担任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同志做了书面检讨。

我在小说里不少地方写了白求恩受到毛泽东思想的教育

和影响，如白求恩对童翻译说：“……中国同志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这一点对我的教育意义更大。过去，我就知道什么病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治疗，什么病应该用什么药；什么手术应该用什么手术器具。我认为这是天经地义不可变更的。我有些时候急躁，主要是从这一方面来的多。现在，我发现我是错了。根据毛泽东的学说，应该是有什么武器用什么武器，在什么地方打什么仗，对付不同的敌人用不同的方法，这就是生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现在深切地了解为什么八路军在工业落后的地区，拿着最坏的武器，有的甚至是原始的武器，可以打最漂亮的胜仗，用劣势的力量可以战胜优势的敌人的道理。在最困难最紧急的时候，锯木头的锯子就是最好的手术器具。方主任是对的。”

这样写，会不会贬低甚至损害白求恩的形象呢？一点也不，反而使读者感到白求恩的形象更加崇高。因为这是马列主义者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这样写，会不会贬低甚至损害晋察冀英雄军民的形象呢？同样的，一点也不，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工业落后物质条件极端困难是“三座大山”剥削压迫的结果，正是因为有这样工业落后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聂荣臻同志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率领晋察冀军民对日本法西斯展开激烈而又频繁的斗争，不断取得胜利，显得晋察冀英雄军民的形象更加高大。

毛主席著作当时在晋察冀根据地还没有英文版发行，白求恩没有可能直接看到毛主席著作，但是从用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起来的八路军指战员身上，从战斗中，从工作中，从作风上，他学习了毛泽东思想，并且给他以很大的影响。小说里

曾写到白求恩对童翻译说：“我曾经进过医科大学，并且是皇家学院外科学士会的会员，可是，我真正进大学并且受到有益的教育，是在毛泽东的部队里。”

关于人物塑造问题，我思考了很久。白求恩到晋察冀后接触过很多人（包括伤病员在内），和白求恩一同工作的同志也不少，上至晋察冀军区卫生部负责同志，直到炊事员和勤务员都有变动，不是自始至终都是那么几个人，即连英文翻译也不只一个，伤病员就更多了。面对这样众多的人物和故事，怎么处理？要是如实写来，不仅重复，而且没有必要。必须集中概括，选择那些比较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和故事，除了白求恩基本上根据“真人真事”外（当然其中也有集中概括部分），其他人物大都是集中概括的，如三五九旅方国桢主任（电影改编者给他换了一个名字，叫方兆元），如徐连长，如童翻译（改编者改称童秘书，即英文翻译），如勤务员邵一平（改编者叫他小邵）……都是在现实生活基础上虚构的，不是“真人真事”，到晋察冀根据地去访问是找不到的，连姓名也是虚构的，有的只保留了姓。

八路军高级指挥员则一律保留真实姓名，不论在小说里出场或者只提到一下。

故事情节也是集中概括的，有的把有关的故事集中到某一个人物身上，有的故事情节改变了时间和地点，便于集中描写。

和白求恩一同工作的大夫，除了写方主任，这个放牛娃出身没有进过正规医科学学校而是在八路军这个大学里成长的医生以外，同时写了军区卫生部尤思华副部长（改编者改称于部

长。)和医务科长凌亮风。他们医疗技术水平是相当高的,如果只突出写方主任,那是片面的,不符合当时情况。

白求恩担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在医疗岗位上参加反对日本法西斯斗争,他是用医疗技术和手术器具参加战斗的。为了写白求恩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的作用和影响,我写了齐会战斗。一二〇师在这场战斗中打败了敌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白求恩在离火线不远的地方抢救伤员,给八路军指战员很大鼓舞。徐连长就是在这一次战斗中重伤不下火线,第二次腹部受伤的。因为他带伤继续战斗,阻止敌人增援部队,因而取得歼灭敌人的胜利,给白求恩深刻的印象和重大的影响。他对这样的反法西斯英雄人物更加关怀备至。白求恩说:“我一想到八路军在火线上那样英勇作战,受了伤还不肯下火线,我身上就生长出一种力量,想多做一点工作。”如果只歌颂白求恩抢救护理徐连长,而不歌颂徐连长的英雄事迹是不够的,因而也会是片面的。

此外,写了伤员肖天平,表现当时医疗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写了许庆成,受伤后流血不止,严重贫血状态,要是不立即进行手术,伤员一定死亡;如果动手术,这样严重贫血状态,结果也是死亡。白求恩决定立即动手术,他把自己的血液输给伤员,救活了濒于死亡边缘的许庆成。最后抢救一名伤员是头部丹毒合并头部蜂窝组炎,白求恩因为给他动手术中毒,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白求恩和群众关系,主要写了两段,一是他给群众看病;一是他化装为老百姓到游击区群众家里看伤员;同时,也是为了表现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军民的鱼水关系,使他赞赏不

已：“在离敌人十多里的地方，有这样的设备，是一个巧妙的有机的结合。先前他不信任部队上把伤员放在老百姓家里会护理得好，面对这样世界上的奇迹，他感到自己太主观了，而中国人民的智慧太伟大了。”原来在游击区负责治疗这部分伤员的冯子辉大夫是男的，改编者把冯大夫改成女的。白求恩受到晋察冀英雄人民热爱和敬佩，而晋察冀英雄人民也给白求恩以重大影响，使他神往这种奇迹。……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含着热泪写完《白求恩大夫》这部小说最后一行。

当时茅盾等同志和我们在香港编辑出版《小说月刊》，这部小说曾在《小说月刊》上连载。龚澎同志喜爱这部小说，她请陈为熙先生翻译成英文，准备介绍在美国或者加拿大出版。当时全国尚未解放，《白求恩大夫》这部小说英文译稿一时未找到适当书店出版。后来这部英文译稿到了加拿大作家泰德·阿兰(Ted Allen)和塞德奈·戈登(Sydney Gordon)手里，他们准备写白求恩传记，《白求恩大夫》小说英文译稿相当多的部分用在他们写的传记里了。作者在前言写了这样一段：

“……中国作家周而复的《白求恩大夫》给了我们莫大的帮助。周而复的第一手叙述对于白求恩本人的日记是重要的对证材料，尤其是关于那些还没有用任何文字在其它任何地方叙述过的事件。周而复的著作，以及其他未出版的材料，都是由陈为熙给我们翻译的。”

白求恩在中国晋察冀参加反对日本法西斯的英勇战斗生活和光辉形象能够早日和英文读者见面，是件好事。

这本传记的名字是：《外科解剖刀就是剑》，于一九五二年

在波士顿出版。一九五四年三月，巴金同志主持的平明出版社把这本传记译成中文出版，书名是《白求恩大夫的故事》，使中国读者有机会了解白求恩在加拿大和西班牙的战斗生活。

全国解放以后，东京和莫斯科翻译出版了《白求恩大夫》这部小说的日文译本和俄文译本。1982年，中国外文出版社又出版了英译本。我感谢译者使白求恩的光辉形象和这两个国家以及英语国家的广大读者见面了。

一九五一年文化部准备把《白求恩大夫》这部小说改编为电影剧本，并且要我自己改编，而且专门派了导演凌子风从北京到上海来找我商谈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写过电影剧本，也没有想过要写电影剧本，因为是文化部的意见，而且是改编白求恩的电影剧本，义不容辞，于是接受了这个任务。尽管我当时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工作很忙，也设法利用业余休息时间把电影剧本写了出来，但很久没有下文。隔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江青的黑手挡住了。她当时窃取文艺岗位上一部分权力，摄制电影的事给她压下了，不准拍！理由是：中国人民的斗争生活还拍不过来，为什么要拍外国人的斗争生活？显然江青一点国际主义的精神也没有，而且对白求恩在中国晋察冀参加反对日本法西斯斗争的伟大意义也不了解。她恐怕连毛主席写的《纪念白求恩》光辉名篇也没有认真学习过，否则怎么会讲出这样无知的话呢？摄制《白求恩大夫》电影剧本就在江青这个白骨精的淫威之下流产了。

一九五八年，荷兰国际知名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思拍完有关中国故事的纪录片《早春》以后，他与司徒慧敏同志和我一起讨论改编《白求恩大夫》这部小说摄制电影问题。我完

全同意他建议摄制《白求恩大夫》电影，来表现白求恩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他早有这个愿望，表现得十分热情。

不久，我到拉丁美洲和欧洲一些国家访问去了，这次出访时间很长，将近一年以后才回到国内。这时，伊文思早已离开中国。摄制《白求恩大夫》电影的事就暂时搁下来了。

一九六二年冬，我收到张骏祥同志一封信：“……根据你写的小说《白求恩大夫》，我改编成电影剧本，兹奉上改编稿本，请审阅指教。……”我看了一遍，觉得改编得不错，有少数地方值得商榷。本来想找机会和他商谈一下，但不久，这个改编本在一九六三年一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他也离开北京，因此未能和他商谈。

一九六四年《白求恩大夫》电影样片送到北京，文化部约我一道看了，我提了一些意见。这以后，很久没有听到样片的消息，直到一九六五年一月，江青看了样片，讲了这样的话：“这个题材根本不能搞，一九五一年文化部就想搞，被我拦住了。你们怎么又搞了？毛主席已经写过纪念文章了，你们还想怎么样？……这部片子坏透了！……”

一九五一年江青的黑手拦住了《白求恩大夫》电影摄制，这是事实，我是亲身经历的。但为什么这个题材根本不能搞呢？毛主席不是号召“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吗？这犯了江青的什么“王法”呢？并且说这部片子“坏透了”，“坏”在什么地方？因为白求恩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吗？因为白求恩是坚强的反对日本法西斯的英雄吗？因为白求恩的共产主义精神吗？因为白求恩的光辉形象会照出她叛徒的嘴脸吗？

江青这个文艺界打砸抢能手，她的一句话，把《白求恩大夫》这部影片打入冷宫，禁锢十三年之久。如果从一九五一年算起，她这只罪恶的黑手把《白求恩大夫》影片压了二十七年之久！

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革命。《白求恩大夫》这部影片才能重见天日，终于和广大观众见面了。《白求恩大夫》这部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已重版了。

不久以前，我看了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白求恩大夫》影片，主要内容和原著小说是相符的，个别地方，值得商榷。这以后，《白求恩大夫》改编电影剧本在《中国文学》上发表了。《中国文学》月刊以英文和法文两种文字出版，实际负责人是何洛。这位何洛女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红人”，经常与另一“红人”于会泳等关系密切，粉碎反革命“四人帮”后，摇身一变，也是“红人”。我看到英文版《中国文学》发表改编电影剧本署名作者张骏祥，而不写出根据周而复所著《白求恩大夫》长篇小说改编，这不是一般的抄袭某些章节，而是将别人作品窃为己有；这是公然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改编者一变而为作者。真正的长篇小说作者，可能要被怀疑侵犯剧本的知识产权了。我向何洛提出意见，希望她在法文版发表时，改正，注明系根据周而复所著长篇小说《白求恩大夫》改编，这是义不容辞应该做的事。可是这位女士竟然蛮横无理地说出这样的话：英文版既然错了，没有说明根据周而复原著改编，法文版也不能改正说明，只有错到底。我们是国家出版社，不能承认错误。这是什么逻辑？难道国家出版社有坚持错误的特

权吗？还是张骏祥有侵犯知识产权的特权？而国家出版社有支持张骏祥侵犯知识产权的特权？

电影摄制得很好，看到改编、导演、演员、摄影和所有参加摄制工作同志的匠心。但少数地方值得改编者考虑：

首先白求恩学习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思想对白求恩的教育和影响，表现得不够。其次，毛主席强调学习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影片中表现略嫌不足。改编者增加某些细节产生很好的效果，如原著小说只在行军中唱《游击队之歌》，改编者在白求恩中毒患病躺在担架上增加唱《游击队之歌》，不仅前后呼应，而且增加悲壮气氛，表现伟大国际主义战士身患重病时的昂扬心情，效果很好。一些观众告诉我，看到这儿哭了。但有的细节改变却值得商榷，如白求恩是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原著小说由军区卫生部尤副部长和他一同行动并领导军区医疗队，到冀中军区和各军分区去医治伤员检查工作，方主任只是做为一个工作人员参加医疗队，一面向白求恩继续学习，一面担任部分工作，这是符合当时情况的。改编者把方主任“提拔”为军区医疗队的政治委员，这不仅削弱了尤副部长的戏，而且不符合实际情况。军区医疗队应该由军区卫生部负责同志参加并领导，而不应该由方主任领导，因为方主任只是三五九旅卫生部的一名卫生主任，怎么能够领导检查各军分区的医疗卫生工作呢？又如徐连长是一二〇师的干部，在冀中齐会战斗腹部受伤被白求恩抢救的。他忽来忽去，改编者没有详细交待，最后把缴获阿部中将的大刀和领章赠送给白求恩。这个细节原著小说是没有的。小说只是写白求恩在参加打扫战场时，从一个日本鬼子尸体上用小刀割下来的少尉

肩章，做个纪念。改编者为了要徐连长赠送阿部中将的大刀和领章给白求恩，在前面一个场合里，增加白求恩下命令要徐连长抓一个活的少将，而在白求恩临死前徐连长送来一个死了的中将的大刀和领章。且不论徐连长并没有参加黄土岭战斗，更不是徐连长打死阿部中将；也不论阿部中将是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被八路军炮兵打死在黄土岭的，战斗一直在继续进行，直到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清晨白求恩逝世，黄土岭的战斗也没有结束，当时不可能把阿部中将的大刀和领章送到远在完县黄石村的白求恩手里，事实上也没有这回事。但文学艺术是允许在现实生活基础上虚构的。我们不妨认为这是可能发生的事吧。但是，党中央、毛主席创造和培育的八路军是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一切缴获要归公”，这是每一个八路军指战员都知道的。就算徐连长参加黄土岭战斗并且缴获了大刀和领章，他也应该向上级报告战果，而不是向白求恩报告；大刀和领章也应该交给上级处理，不能自己随便赠送给白求恩的。原著小说齐会战斗的胜利品，如日本呢大衣和罐头等，是贺龙师长送给白求恩的。看来改编者张骏祥抗日战争期间，没有到过敌后民主抗日根据地，不了解八路军的生活，只是片面追求戏剧效果，而没有考虑历史的真实。改编者增加这个细节，如果徐连长说明是奉军区聂司令员或其他高级指挥员命令要他送来的，那就比较合理一些。现在这样处理，反而有损于徐连长的形象。……

我提的意见，只是白璧微瑕，这仍然是一部优秀的感人影片。就三十一年多以前所写的原著小说来讲，需要修改的地方同样不少，虽然受到国内外读者的欢迎，那主要因为伟大